

[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系列出版物

民有民享 中国私营经济的崛起

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R. Lardy] / 著

郑小希 / 译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SECTOR BUSINESS IN CHINA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系列出版物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SECTOR BUSINESS IN CHINA

民有民享
中国私营经济的崛起

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R. Lardy] / 著

郑小希 / 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有民享——中国私营经济的崛起/ (美) 拉迪著; 郑小希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77-0303-7

I. ①民… II. ①拉… ②郑… III. ①中国经济—私营经济—研究
IV. ①F121.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60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2015 -0926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by Nicholas R. Lardy
Copyright © 2014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民有民享——中国私营经济的崛起

著作责任者: [美] 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R. Lardy)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303-7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l6@vip.sohu.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致谢

感谢瑞恩·卢考夫斯基和尼古拉斯·博斯特，帮助我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及众多经济和金融机构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提取出本书所需的数据。没有他们，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完成。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成员在2014年1月对本书草稿的一场讨论也令我获益良多，感谢纳撒尼尔·阿伦斯、史蒂夫·巴奈特、尼古拉斯·博斯特、亚当·鲍森、帕特里克·道格拉斯、大卫·多勒、埃德温·杜鲁门、卡拉·弗里德曼、尼古拉斯·弗农、马特·古德曼、黄育川、阿尔伯特·凯德尔、威廉·克莱因、黛博拉·马克斯、瑞恩·卢考夫斯基、马库斯·诺兰德、阿温德·苏布拉曼尼恩、达蒙·希尔弗斯、卡拉·希尔斯等研究者的帮助。弗莱泽·霍维和德怀特·珀金斯看过本书草稿后，寄来了详尽充实的建议。第二稿的正式同行评审黄益平、大卫·M. 兰普顿和杨涛也为书稿提供了重要建议，使得终稿最终成形。还有许多人，包括安德鲁·巴特森、斯科特·肯尼迪、穆嘉、巴里·诺顿、马库斯·罗德劳尔、丹·罗森、托马斯·罗斯基、张少玲等，协助我解决了撰写本书时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在此一并致以感谢。

本书成稿过程中，我有幸在诸多场合宣讲了书中的研究成果，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中国人民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的会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东京举办的学术会议、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经济对话在美国和中国的研讨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共同在台北举办的研讨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共同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上的提问和点评极大地充实了本书的研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鲍森不仅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更推动研究所对中国开展更广泛的研究与交流。负责出版和沟通事宜的副所长史蒂夫·怀斯曼领导着一支优秀的团队，包括负责印制和设计的苏珊·柳金，以及负责编辑书稿的瓦莱丽·诺威尔。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序言

众所周知，过去 35 年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持续而惊人的经济增长，然而背后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将中国经济发展归功于政府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政府更愿意直接掌控经济制高点，避开对市场力量的依赖。上述观点认为，毋庸置疑，中国的私营企业正在发展壮大，但政府通过国有银行系统分配贷款，间接影响其他经济部门。尼古拉斯·拉迪教授用具有说服力的论述推翻了上述观点。拉迪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 1978 年以来维持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私营部门获得解放，国有部门不断缩减，即“民进国退”。市场力量在资源分配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私营企业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元素。拉迪教授的研究显示，私营企业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所有新增就业岗位，为中国在全球贸易领域的不断崛起贡献着重要力量。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缘于资本主义程度加深。因此，至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层面，中国并没有采取某种资本主义以外的新模式。

此外，本书汇集的资料颠覆了一种经常被强调的观点，即在胡温时期（2003 ~ 2013 年），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所提升。的确，胡温政府制订的工业政策似乎更倾向国有企业，

而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利。然而拉迪教授全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出台的政策并未收到太大效果。国有企业相对私营企业的财务业绩仅在短期稍有上升，随即迅速跌落，2012年，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仅为私营企业的1/3。到2013年，私营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甚至大于胡温政府执政前的情形。

在拉迪教授看来，中国新领导层面对的决定性考验是目前仍由低效的国有企业主导的服务业。拉迪教授的主要论点是，即使近年来贷款和投资已经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开放私营企业进入服务业将会显著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拉迪教授看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代表的现任领导集体正在寻求转变政府职能，将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与市场。上述观点可以从政府至今为止的声明得到证实，尤其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习李政府似乎更倾向于解决一些不太扭曲的当务之急，例如提高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和食品安全、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均衡发展等公众需求越发强烈的问题。拉迪教授援引政府公开声明，论述政府将进一步增强市场作用，具体方法包括取消现存的价格控制（例如取消银行存款利率限制，促使资源合理分配），以及降低私营企业进入服务业面临的监管壁垒。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开展已久。拥有安东尼·M. 所罗门高级研究员头衔的尼古拉斯·拉迪教授，从1994年出版《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以来，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我们也开展了更多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研究所近两年发表了8篇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政策简报和工作报告，创建了“中国经济

观察”(China Economic Watch) 博客, 专门剖析中国的经济政策, 并且定期发表“中国再平衡观察”。多名作者撰写了许多与中国经济相关的书籍, 包括 2006 年出版的《账簿中国》, 2008 年出版的《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 阿温德·苏布拉曼尼恩 (Arvind Subramanian) 2011 年撰写的《中国阴影笼罩下的印度经济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以及 C. 弗雷德·伯格斯滕、加里·胡夫鲍尔等合著, 2014 年底即将出版的《联结太平洋: 展望中美自由贸易和投资 (Bridge the Pacific: 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①。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是一家非营利私人研究机构, 以严谨、开放、真诚为宗旨研讨国际经济政策。彼得森研究所的目标是发现并分析使得全球化能够持续地造福美国 and 全球人民的重要问题, 并对此发明、探讨新的实用解决方法。研究所本身不具任何党派立场。

研究所日常工作资金来自众多不同的慈善组织、私营企业和感兴趣的个人赞助, 以及投资基金收入。上一财年, 35% 的资源来自美国以外的赞助者。之前年份的赞助者名单参见 <http://piie.com/content/?ID=133>。

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负责确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为研究项目提供整体指导和批准, 评估项目是否达成目标。所长负责鉴别中期 (1~3 年) 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由成员开展研究的课题。这项常规议程是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董事会成员以及其

① 译者注: 此书 (英文) 现已出版。

他股东密切商议后决定的。

研究项目的出版由所长做最终决定，此后将经过独立的内部和外部评审。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 www.piie.com 搜索书籍标题，研究或引用作品所依据的资料与计算过程。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和其他活动为国际经济政策解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如果您对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有所建议，诚挚地欢迎您向我们提出。

亚当·S. 鲍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4 年 6 月

引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经济改革启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如此之久。2013 年，中国的经济水平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25 倍。中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百分比也因此增长了 3 倍有余，从不足 3% 攀升至 12%。在此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了 6 个发达工业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放弃了毛泽东时代追求的自给自足式贸易与投资政策，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经济体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上述指标的人均数据排名相对较后。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仍然有所上升。1980 年，世界银行有关报告（1982：110 ~ 111）将中国及其他 30 个左右最贫穷的国家一起，列为低收入经济体。2013 年，中国被调整为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位于 55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之上。

本书致力于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市场和私营经济的作用展开研究，提出了三项主要论题。其一，中国在 1978 年后经济迅速增长，主要原因为市场力量在资源分配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一种新近形成但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政府采用特有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避免依赖市场，而是倾向于保留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所有权，中国有时称之为“掌握

经济制高点”，并且通过国有银行系统的资产分配，有力地间接控制其余的经济活动。然而，本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力量，而非政府采取的经济模式。

其二，研究发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其任期内（2003～2013年）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广为流传的观点，其实鲜有资料支持。

其三，本书研究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有可能主要源自市场，而非国家。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代表的新任领导层很有可能延续2013年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继续强化市场作用。既得利益方可能试图阻碍这一趋势。然而，目前看来，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太可能像其前任那样在经济的根本改革问题上步履维艰，转而尝试通过工业政策带动经济增长这样更依赖国有企业的模式。尽管如此，如果想要增强市场的作用，使得中国获得高于全球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加大政府职能的调整力度，尤其是调整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始于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其中，私营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唯一来源以及中国日益成为重要的全球贸易国的主要推动因素。本书研究认为，胡温时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的论点缺乏依据，因为当时私营企业仍在不断替代国有企业。不过，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政府有必要解除其对国有企业受保护领域的控制，以促进竞争、完成定价改革，尤其是改革能源和资本的价格，因为目前对二者价格的保护阻碍了整个经济过程的资源有效配置。

本书第1章对市场定价取代国家定价的过程进行概述，这是中国经济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基础。经济改革前，几乎所有重要商品的价格都由全国物价委员会决定，而不考虑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当时公司的利润和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基本无关。现在的大多数市场则是竞争性的：价格能够反映出供需关系，而非由少数大公司操控市场。在竞争市场中，定价规则的转变为投资带来根本转折。在以前的投资系统中，企业将全部收入上缴至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重点投资项目，从国家预算中拨款支持。定价规则转变后，形成了一套新系统，金融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企业的留存收益，因此银行贷款变得尤为重要。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公司生产力越优秀，留存收益就越高，也就越能因此扩大融资，迅速扩展规模。正因如此，中国经济逐渐转型，形成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始于1980年代的快速增长。最后，本章记录了中国人力资源配置的变化：城市工作早先是统一分配、终身雇佣，由机关工作人员确定工资标准；现在的人力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市场主导。

第2章纵观中国国有企业发展长久存在的问题。1980年代前期，得益于农业改革，农作物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有企业的迟缓发展。本章论述了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两项改革方案。第一项改革方案，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国有企业规模大量缩减。破产、兼并及私有化使得国有工业企业数量锐减至原有规模的1/4，数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这次重组后，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可观增长。

第二项改革方案始于 2003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成立。国资委重点关注大型国有企业，其成立时间恰好与几项关键的工业政策发布时间吻合，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对国有企业有利的布局，意味着国有资产在工业领域重新崛起。然而，本书第 2 章分析认为，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在全部非金融公司的利润中所占比例曾在 2006 ~ 2007 年达到最高值，但其后开始显著下降。国资委监管下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也于 2005 年左右逐渐下降，目前已远低于其资本成本。这些发现表明，国资委并非如传闻所言，有能力扭转大型重要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

第 3 章阐述所有制结构的剧变。以前，几乎所有经济产出都来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现在私营企业产出约占总量的 2/3。由这种转变可以推断，1978 年以来，几乎所有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都来自私营企业。从那时起，公有制企业的就业机会已经缩水了数千万个，目前提供的岗位仅占城市工作岗位的 10%。私营企业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就业增长的唯一来源，以及促使中国成为日益重要的全球贸易国的主要推动因素。

上述所有制剧烈转变由三个主要因素促成。首先，国家对私营经济活动的政策逐渐演变。经济改革初期，除少数特例以外，国家政策对私营经济有强烈的歧视；如今的政策则趋于中立，即国家政策向所有企业提供平等待遇，无论其所有制为何。其次，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远远高于国有企业，据此可知，私营企业的留存收益与资产比高于国有企业，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来扩大规模，因而发展得更快。再次，私营企业的银

行贷款能力大幅上升，平均而言，2010~2012年银行发放给私营企业的新贷款比发放给国有企业的高出2/3。因此，类似“国有企业强烈的贷款欲望挤占了私营企业的贷款空间”这样时有所闻的断言，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最后，第3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私营部门的地位。研究显示，企业家通过入党获得声望，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商业利益。尽管目前企业家中的党员人数已达数百万之巨，但共产党并未借此对私营产业施加影响。

本书第4章是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前瞻。尽管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但程度仍有不足。虽然国有企业占中国经济产量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在银行贷款和投资资源的权利等方面的优势并未相应缩减。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远低于资本成本。这个事实清晰地表明，国有企业依然是拖慢经济增长的沉重累赘。此外，在某些领域，主要是公共服务机构，仍然通过政策壁垒阻止私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几乎完全操控这些领域，然而生产力极低。

习近平和李克强明确表示，要解除国家对某些价格领域的管控，并且在公共服务领域鼓励竞争，从而进一步增强市场的作用。这些变化将有望重现19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开放浪潮，从而引发国有企业的式微。如果习近平和李克强能够克服以往改革中曾出现的既得利益方的阻碍，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就必须加速前进；否则，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份额就会缩减。无论哪种结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

本书研究中列举的证据，很少符合那些将中国的发展视作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Bremmer, 2010）。尽管他们的用词不尽相同，例如“威权资本主义”、“企业列宁主义”、“监管资本

主义”等，对中国经济发展策略所持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这部分学者都认为，一种更倾向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战略已经扰乱乃至替代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James McGregor, 2010, 2012; Lee, 2012; Hsueh, 2011）。在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典范的研究者看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战略始于胡温时代前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加速。

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方案十分激进，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2009~2010年，当美国和其他很多工业发达国家都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依然高达将近10%。

然而，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以政府为中心。这项方案确实极大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铁道部和数千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工程进展，后者负责建设道路、铁路、供水、污水处理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然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里，政府都是基础建设投资的关键角色。因此，这一类项目中政府作用暂时快速提升，不应成为评判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否中断或终止的依据。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能够加速投资，从而维持增长速度的第二大原因就来自私营企业。经济危机前，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已经迅速火爆起来。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论述道，商品房市场升温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政策无意间让私人房产成为了中国高储蓄家庭的首选投资类别（Lardy, 2012）。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过热已经持续了至少5年。如果在未来节制私人房产投资，中国将有可能面临显著的宏观经济危机，因为与住房相关的各种需求，从钢铁、水泥、铝材、铜等建筑材料，到家用产品乃

至汽车，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过热的房地产投资与中国经济是否转向国家主导之间很难产生关联。

工业和公共服务业是投资增量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很多人有这样的第一印象：国有企业大幅度增加从国有银行的贷款金额，并且以损害私营企业利益为代价。然而这一印象具有欺骗性。国有企业的贷款金额的确有所上升，但本研究的资料表明，这些企业并未仔细挑选投资目标，因此近年来，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同时，私营企业在经济危机期间和刚刚结束之后也大幅度贷款。与国有企业相反，私营企业的投资目标一般都经过精心挑选。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依然持续上升。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逐渐增加，而国有企业的份额则大幅下降。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的众多政府机构收集并发表的数据。

专栏 1**中国的统计数据有多可靠？**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即中国的市场力量正在兴起，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那么，这些官方数据是否足够可靠，能够证明上述结论呢？

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不过整体水平正在稳步提升。有些数据存在明显缺陷，但不是因为统计有误，而是因为概念的缺陷。例如统计城市地区失业人口时，由于“城市劳动力”概念局限，分子和分母都只包括拥有城市户口

的个体。当中国的出口行业在 2009 年第一季度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跌入谷底，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加工行业失业人数高达 2000 万时，中国的失业率数据仍然维持不变^①，因为这些失业人员中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一般不计入城市劳动力之中。因此，即使城市失业率的数据在中国采取的定义内统计得准确无误，但如果你想研究的是外部冲击对国内城市就业情况的影响，这个数据就没有意义。与此同时，央行关于存款、贷款以及各种货币供应的数据则相当准确^②。银行业的监管十分严格；由于银行数量很少，数据计算起来比数百万家企业以及 1 亿以上的农户都要简便得多；存款和贷款的计量单位简单明了；汇报数据的可靠性很容易通过对金融机构进行审计来核查；央行也不存在明显的动机来谎报货币供应数据。

随着经济数据的质量提升，统计部门也愿意越来越频繁地公布数据。以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例，该机构在 1990 年代只公布年度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公布时间一般严重滞后；然而从 2010 年开始，该机构开始按季度发布数据^③，发布时间的延迟也明显缩短了。更重要的是，数据粒度也在逐渐细化。1990 年代，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经常账户只包含 4 个分类：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收入、转移，然而最近几年，该机构发布的数据将服务贸易细化成了 13 个分类。

不过，中国发布的其他统计数据，尤其是 GDP 数据仍然备受质疑。怀疑者认为，衡量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生产和